

逸耀東 ● 著

從平城到洛陽

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

從平城到洛陽

——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

遼耀東 著

68·3·0361

·61012·

從平城到洛陽——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

著者 遼 耀 東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·三九四〇一三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八月第三次印行

定價：新臺幣一三〇元

目錄

導言	一
第一章 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	二八
第二章 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	七四
第三章 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	一〇三
第四章 北魏平城對洛陽規建的影響	一三六
第五章 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	一五九
第六章 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係	二三七
附錄 試釋論漢匈之間的甌脫	二七三
跋記	二八四

導言

討論近代中國以前的歷史，無可否認地，邊疆民族與漢民族以長城爲基線所發生的衝突與鬭爭，對彼此歷史形成的激盪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題。尤其邊疆民族進入長城之內後，在中國建立統治政權，與廣大的漢族人民，基礎深厚的漢文化直接接觸，促使其自身文化發生轉變，經過不同階段的衝突與調整，最後融合爲一。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演變與發展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和積極的作用。

不過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傳統的中國歷史學家却有另一種解釋。那就是邊疆民族徘徊在長城之外，對漢民族的邊疆，進行不定期而且不斷的掠奪或攻擊時，則將這兩個民族以長城爲界限對立起來，認爲「非吾族類其心必異」^①。並以爲邊疆民族進入長城之後，則必然通過

① 王船山，讀通鑑論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一九六七，影印本），卷十四，頁二上，「東晉哀帝」：「夷狄之與華夏，所生異地。其地異，其氣異矣。氣異而習異，習異而所知所行幾不異焉。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。特地不分，天氣殊，而不可亂，亂則人極毀，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。」是這種論點最高度的發揮。

「用夏變夷」的階段，最後達到「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」的境界。③這種以長城為基點，漢文化為本位的論點交互應用所作的解釋，固然突出了漢文化的優越性，與在文化接觸時所表現的彈性與兼容性。④但却將兩種不同類型文化接觸與融合的過程單純化了。⑤這種感情性

① 夷夏對立的問題，一向是傳統中國史家注意的問題，爭論也極多。一般說來，傳統中國史家多從「文化」上的區別，來評斷夷夏的對立與否，並從文化上來貶抑夷狄。這種論點當自殷周之後才形成，並在孔子及其後的儒家理論中，佔有重要地位。孔子所謂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（《論語·憲問》）等，就是從「文化」的觀點來區分夷夏。夷夏對立觀點確立之後，則「用夏變夷」以及「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」，就很自然的成為儒家的理想，譬如：韓愈「原道」所謂：「孔子之作春秋也，諸侯用夷禮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經曰：『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。』」詩曰：「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」今也，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？」從這裡多少可以窺見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對夷夏問題所持的態度。

② 姚從吾師對於中國文化的兼容性，有獨到的發揮，見「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」，原載大陸雜誌，十五卷六期（一九五七），後收入東北史論叢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一九五九、七〇），上冊，頁一—二六。

③ 兩種不同類型文化接觸與融合的過程，人類學家有繁多的理論。即以現代研究中國歷史的中外學者而言，其理論也極複雜，並不像傳統史家的單純化解釋。譬如：姚從吾師認為：中華民族與文化的形成，經過「五大醞釀、四大混合」，遠種民族文化和中原儒教大同文化接觸後，雖然經過大同的階段，但最後兩者都融合為一了。參見註③。陶晉生兄在研究華北女真漢化後，認為：自金朝建立後，女真人就逐步漢化，因而引起內部危機，包括政治開爭和社會衝突，本土化運動等，最後終因各種因素的配合，而達到較為徹底的漢化。事實上，女真漢化的過程，可以由「涵化」(acculturation)的理論，來解釋其中部份現象。參看：黃清遠，「評介陶晉生教授著：『十二世紀華北女真漢化研究』」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，十卷七期（一九七七），頁一—二四—三〇。西方學者們的解釋，也相當複雜，如：社會史家艾伯華（W. Eberhard）採取「部份傳統中國的全部漢化說」，並認為外來征服者與漢族人民有相互的影響。維特佛格爾（K. A. Wittfogel）認為漢族並不能完全吸收收入優於對立的地誰，對也不能同化誰。費正清（J. K. Fairbank）與賴世和（E. O. Reischauer）認為華夷有共同治理中國的經驗，其制度通常是二元的，他們部份同意遠種民族最後要走向漢化。以上西方學者的解釋，參看：陶晉生，「歷史上漢族與遠種民族關係的幾種解釋」，遠種史研究集——宋金時期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七一），頁一六—二三。

的解釋，即使在近代與西方文化接觸後，仍然發生支配性的影響，使中國在和近代西方文化接觸過程中，產生許多不必要的挫折。^⑤

事實上，即使那些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，最後放棄自己原來享有的文化傳統，完全融合於漢文化之中，其歷程也往往是非常轉折與艱辛的。因為文化接觸與融合的因素非常複雜，往往在接觸與融合的過程中，一旦遭遇挫折與阻礙，必須經過不斷地再學習、再適應、再調整之後才能完成。而且不論融合或被融合的雙方，都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，甚至被融合的民族完全放棄自身的文化傳統，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，無法完全被融合而殘留下來。這些殘留下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取後，經過轉變成爲一種新的文化成份；不僅豐富了漢文化的內容，也增強了漢文化的活動力量。中國歷史自魏晉以後，由於邊疆民族不斷擁入長城，結束了漢民族在長城之內單獨活動的時期後，漢民族不斷地和不同的邊疆民族進行接觸與融合，使漢文化增添更多的新內容，中國歷史的發展也更加多姿。

拓跋氏族進入長城後的文化轉變，就是上述理論的一個最好例證；並對中國歷史的發展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，在永嘉風暴中，拓跋氏族最後進入長城，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的殘局，並總結了自秦漢以來，漢民族與邊疆民族以長城爲基線的衝突與鬭爭。同時對東漢以來，滲入長城的其他邊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，然後以此爲基礎，和漢民族作一次澈底的融

⑤ 參看：拙作，「城裏城外——談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知識份子」，勒馬長城（臺北：言心出版社，一九七七），

合。經過這次融合以後，新的血輪注入漢民族之中，新的文化因子也開始在漢文化中孕育。後來，這些新血輪與新文化因子，又轉變成支持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。

從太祖拓跋珪天賜三年（四〇六），創建平城作為北魏前期的首都，到高祖拓跋宏太和十七年（四九三），爲了準備遷都而規建洛陽，前後經過將近一個世紀，這一個世紀是拓跋魏文化轉變的重要時期。由最初的胡漢雜揉的文化形態，轉變爲到最後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，融於漢文化之中，是本書討論與探索的範圍，其中包括「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」、「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」、「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」、「拓跋氏與中原民族的婚姻關係」、「平城對洛陽規建的影響」、「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係」，都環繞着這個論題，研究拓跋魏與漢文化直接接觸後，在不同的轉變階段，所產生的不同的問題與影響。

一

原居於嫩江東北，額爾古納河東南地區的拓跋氏部族，最初雖然有了原始的農業生產經驗^⑥。但正式由游牧轉向農業生產，却是徘徊在長城之外的一〇五年的後期。當時他們的游牧區漸漸越出河套地區，游牧的範圍西到五原，東到幽州的代郡和上谷附近。這一帶正是漢武帝擊敗匈奴後，極力經營的地區。漢武帝曾在這裡築塢堡，開郡縣，移民實邊。雖然當時

⑥ 河地重造，「北魏王朝の成立とその性格について」，東洋史研究，十二卷五號（一九五三），頁一八〇四。
六。認為拓跋氏部族最初已有農業生產，但這種農業生產是微不足道的。

祇爲了消極的佔領，將長城的防線延伸到草原與農業的地帶，却意外地將農業文化的種子，播散到草原文化地區的邊疆，在那裡形成許多分散的小農業社會單位，對後來草原和農業文化的接觸和融合，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^⑥。

作爲草原與農業文化分界線的長城，由於漢高祖七年平城之役失敗後，退縮爲防止邊疆民族入侵的防線。此後維持長城防線的安寧，成爲每個時代對外的主要策略。如果農業社會的軍事力量超越草原民族，並且深入沙漠，便會在長城外農業與草原的過渡地帶；建立許多防衛性的屯墾區，成爲小農業社會單位，以拱衛長城防線。不過，一旦農業民族的力量又退回長城，無法控制這些邊緣地區的防衛據點，草原民族的勢力就立即進駐這個地區。

這些分散在長城外的小農業社會單位，在農業民族的力量撤退以後，便斬斷和長城內母體社會的文化臍帶關係而獨立發展。因爲地處於農業和草原的過渡地帶，很快就形成半農半牧的社會經濟形態。草原民族進駐這個地區後，漸漸放棄一部遊份牧，採取某種程度的農耕。在那裡且牧且耕，等待機會向長城之內滲透。當農業社會民族的力量退縮，而且長城之內的政治或社會情況又在動盪的時候，停留在這個地區的草原民族，便乘機翻越長城進入中國，在長城之內建立統治的政權。於是另一個草原民族又迅速遞補，進駐這個地區，在那裡等待機會進入長城。

那些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，不僅建立政權，而且開始修補長城，更進一步代替農業民族

⑥ 拙作，「勒馬長城」，勒馬長城，頁三一—一八。

執干戈以衛長城，阻止另一批草原民族入侵，並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，採取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，而漸漸漢化了。至於漢化程度的深淺與緩速，恰和他們居住這個地區時間的久暫成反比。這是討論自漢以後，滿清入關以前，草原與農業文化接觸與轉變，可探索的軌跡。本書附錄「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」，即探討這個地區建立的經過，及草原民族進駐這個地區後，文化與社會形態轉變的過程。

拓跋氏部族也會在這個地區居停，而且居停了較久的時間，「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」，即討論拓跋氏部族在這個地區文化轉變的過程，及其進入長城建立國家後，所發生的作用和影響。不過，拓跋氏部族進駐這個地區之初，遊牧經濟仍然是主導的力量。因為遊牧經濟不僅是他們的主要生活資料，也是他們對外擴張的戰鬥力量。但是當拓跋部族積極發展畜牧事業的時候，已經開始經營農業了，除了這個地區原有的農業基礎影響外，拓跋氏部族經營農業最現實的原因，還是由於不斷向外擴張。由於他們不僅獲得大量的牲畜，並且劫掠了衆多的人口，再加上許多歸附部落，原有的社會經濟基礎，不足以維持所統治人民的生計，不得不從事農業生產。

不過，最初拓跋氏部族的遊牧民，並沒有直接從事農業生產，農業生產的工作是由原居住在這個過渡地區的「烏桓雜人」及「雁門」晉人負責。他們原先就在這裡從事農業生產，並沒有因為拓跋氏部族的統治，改變原來的生產方式。後來由於拓跋猗盧協助劉琨，而獲得雁門陘北五縣之地，劉琨將原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遷走。於是拓跋猗盧立即遷徙原來他統治下從事農業生產的「烏桓雜人」與「雁門人」，填補這個真空地區，利用原有的農業生產

基礎，有計劃地從事農業生產。至於拓跋氏部族的部民參加農業生產，却在什翼犍被符堅所滅，拓跋氏部族瓦解以後。符堅分散其部落於「漢障故地」，強迫原來的拓跋部族的遊牧民定居下來，並且遣派官員監視他們從事農業生產。對加速拓跋氏部族的遊牧經濟形態轉向農業經濟，產生了關鍵性的作用和影響。後來太祖拓跋珪登國九年（西元三九四年）拓跋儀在五原至固陽塞一帶的屯田，便利用這個基礎繼續發展，並獲得豐碩的成果。這次屯田的成功增強了拓跋氏部族發展農業生產的信心。因此，在這次屯田的後三年（三九七年）拓跋珪便從他控制的地區，遷徙「山東六州」民吏三十六萬口，到首都平城的京畿地區。④這批徙民到達之後，立即計口授田，並配給耕牛，有計劃地發展農業生產。過去，拓跋氏部族祇利用過渡地區的農業基礎，從事有限度的農業生產，這次却是由中原地區真正的農民，直接擔負起農業生產的工作。

農業生產雖然擴大了，但拓跋氏部族的遊牧經濟的畜牧事業，並沒有因此而衰退，仍然是國家收入的主要部份。（國家的稅收還是以牛馬的頭數計算；對外征戰的俘獲品中，賜賞臣下的仍以畜產為單位。）同時，拓跋氏部族的草原文化氣息，也不因農業文化擴大影響而減弱。因此，拓跋氏統治者雖然分劃固定的區域，給那些歸國的部落長居位，但仍然允許他們保持「夏歸部落」的遊牧習慣。而拓跋氏君主每年六月也到陰山「却霜」。雖然拓跋珪君主已

④ 唐長孺，「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」，認為「六州」是指後燕故地。見氏著：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》（一九五七），頁二二一。

建立平城爲固定的都城，但大部份的時間，仍車駕奔馳在外，享受着遷徙、射獵的草原生活情趣。在日常生活的衣食方面，雖然他們非常欣賞農業社會的錦帛，但却不願放棄傳統的衣着，太武帝拓跋燾就明白的表示：「國人皆着皮袴，何用絲帛！」酪漿畜肉是草原民族主要飲食，即使後來熱愛中國文化的孝文帝，仍然不願放棄這種傳統的飲食習慣。

固然，在兩種不同類型文化接觸時，某些文化的特質比較不易同化，而被保存下來，這是每一個社會文化轉變期間共有的現象。但是拓跋氏君主最初爲了表現征服者的優越感，頑固地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太武帝拓跋珪就認爲「國俗敦樸，嗜欲憂少，不可啓其心機，而導其巧利。」並反對他的部民接受中原文化。後來到世祖拓跋燾時代，農業文化已在各方面，對拓跋氏部族擴大了影響。再堅持抗拒這個潮流已不可能，但拓跋燾對於文化的轉變，仍然採取保留的態度。他認爲文化的轉變不可操之過急。「有似園中之鹿，急則衝突，緩則定之。」

拓跋氏君主對文化接觸的態度既然如此，但事實上，當拓跋氏部族進入長城以後，由於對外戰爭的勝利，佔領的地區不斷擴展，統治的人口也隨着增加。以他們過去部落時期統治的經驗，已無法統治一個人口衆多，文化與經濟都超越他們的社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就必須一個完善的制度，以及支持這個制度的文化基礎。可是對此二者，拓跋氏君主像過去其他統治中原地區的邊疆君主一樣，仍然淺薄無知。爲了填補中間的文化空隙，爲了鞏固他們的統治政權，就不得不從中國文化傳統及歷史裡吸取經驗。拓跋氏君主對於中國文化的興趣非常廣泛，他們既愛儒家、又喜黃老，不過他們似對法家更有偏好。因爲透過法家思想的媒介，

可以將部落時代首長的絕對權威，過渡到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政體來。

因此，拓跋氏君主最初所需要的，並不是純粹的漢文化，而是從漢文化中吸取統治的經驗。所以，最初在政治上引用的漢人，也不是純粹的漢人。多是「居近塞下」有胡化成份的漢人，或「往來中國」受農業文化薰陶的胡人。這些人生活在兩種文化之間，對草原文化的方式沒有隔閡的困難，可以與拓跋氏君主合作無間。另一方面對農業文化也有某種種度的了解，可以協助拓跋氏君主解決兩種文化接觸時，所產生的種種問題。這也是在中國歷史上，每一個草原民族進入長城之後，建立統治政權之初，必須引用這一類型人物的原因。^④他們對於北魏王朝的建立有不可磨滅的影響，由於他們居間的協調，緩和了當時草原與農業文化接觸時的衝突。

二

「居近塞下」與「往來中國」的漢人和胡人，雖然對北魏的建國貢獻了他們的力量。不過，拓跋氏部族統治的範圍繼續擴大後，他們的能力和經驗，已不足應付迅速發展所形成的複雜局面。於是拓跋氏君主就不得不把目標轉向有政治經驗的中原士大夫。對北魏建國有積極貢獻的燕鳳和崔玄伯就是在這種情形下，參加拓跋氏的政權。不過大批的中原士大夫參與

④ 參看：姚從吾師，「遼金元時期通考」，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（一九六七），頁二〇七—二一；楊聯陞，「中國文化中的媒介人物」，大陸雜誌，十五卷四期（一九五七），頁二九—三六。

拓跋氏政權，却是在拓跋珪皇始二年（三九七），破後燕慕容寶於中山之後。在這次戰役中，不僅獲得慕容寶「所署公卿、將士、士卒降者二萬餘人。同時得到「皇帝璽綬、圖書、府庫珍寶、漢冊數萬」。拓跋氏族利用這批戰利品作基礎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，完成了建立一個國家所需要的典章制度。

永嘉風暴以後，黃河流域所建立的許多邊疆政權中，慕容氏所建的幾個國家，漢化的程度比較深，對中原士大夫也比較尊重，因此得到中原士大夫的支持與合作。拓跋氏政權很幸運地承繼了這個成果。拓跋氏政權不僅從慕容氏獲得建國所需要的資料，後來又從河西接受了支持這個國家的文化基礎^⑤。這是當時許多邊疆政權在黃河流域匆匆建立，又匆匆崩潰；而拓跋氏族却能在不斷的演變中，不僅結束了北方的動亂，又維持一百五十年統治政權的主要原因。不過，中原士大夫的智慧與經驗的結晶，却是北魏建國的基石。

可是，拓跋氏統治者對於貢獻心智的中原士大夫，並無感激之情，因為他們是被征服者，既得不到適當的尊敬，也得不到適當的待遇，祇有憑藉着征服者的意旨工作，對非我族類的草原文化特質不敢觸動，更談不上進一步的改革。所以許多草原文化的因素被留下來，形成北魏建國初期在典章制度，在官制、禮樂、車服各方面，「稍潛華典，胡風、國俗，雜相揉亂」的形態。

這種「雜相揉亂」的形態，自拓跋珪建國以後，相繼發展；到拓跋燾時期，面臨着一個

⑤ 陳寅恪，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」，陳寅恪先生論文集（臺北：九思出版社，一九七七），頁三六。

抉擇的時代，也是北魏前期歷史與文化轉變的關鍵時代。因為這時北魏不僅統一了黃河流域，結束了永嘉以來中國北方混亂的局面，而且北魏的勢力深入西域，這是自漢帝國崩潰後所沒有的現象。另一方面，江南的局勢也在變化，劉宋篡晉自立，形成中國歷史上南北對峙的局面。

不過，這時在北魏的內部，却有許多草原與農業文化接觸後所產生的問題等待解決：到底保持原有的草原文化形態？還是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，投入漢文化之中？或是仍然維持現狀，繼續這種雜相揉亂形態的發展？對這些問題，他們感到困惑與徬徨。這是拓跋氏族匆匆採用中國的文化形式，鑄造自己國家後，發展到現在需要一次文化的調整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崔浩躍上了歷史的舞台。

崔浩是一個從中國文化傳統裡，薰陶出來的典型知識份子。但在動亂中的知識份子命運是很悲慘的，尤其永嘉風暴後的北方的知識份子，更是如此。他們在動亂中流離失所，從一個邊疆政權，過渡到另一個邊疆政權。爲了生存，放棄了知識份子的尊嚴，在征服者的羽翼下討生活。他們唯一的目的，就是在動亂中保存自己及家族的生命。沒有希望、沒有理想、更沒有對現狀改革的企圖。可是崔浩却不同，他有突破現狀的雄心壯志，這正是後來他的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。「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」，所分析的就是崔浩爲實現自己的文化理想，但却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，不僅犧牲了個人和他的家族，還有一大批追隨他的中原士大夫，是這幕悲劇形成的背景。

崔浩不僅對中國文化有宗教的熱忱，而且對在動亂中沒落的門第懷有濃厚的感情，更羸

因門第而形成的世族政治充滿懷念與憧憬。但我們却不能忽略他的一生，完全消磨在這種胡漢雜揉的社會中。在他七十歲生命的前二十年，隨着他父親崔玄伯在不同的邊疆政權中流轉，最後進入拓跋氏政權。因此，在他的人格形成階段，分享兩種不同的文化生活，他的家族所教育他是一種行為模式；他生活的社會所給予他的，却是另一種形態。尤其進入北魏以後，所面臨的又是一個胡漢雜揉社會。但由於過去的經驗，他了解如何適應這個社會。由於他對草原文化有深刻的認識與了解，他知道如何為拓跋氏君主服務，並且獲得他們的賞識與信任。使他能拓跋氏權力中心中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不過，在他內心深處却充滿文化的優越感，在他看來，對於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揚，不僅是他的責任，甚至是一種神聖的使命。

崔浩鄙視與嫌棄在他生活的社會中，所保存的草原文化因素，而且態度非常固執與偏激。因此，祇要他一把握機會，就會對這個胡漢雜揉的社會進行改革，但也僅僅止於改革而已，並沒有推翻現實社會的企圖。而且他謹慎又努力地替拓跋氏君主工作，祇希望在拓跋氏君主的支持下，完成他的改革。他最佩服的歷史人物是王猛。他也想像王猛一樣，得到符堅的絕對信任，實現他的理想與抱負。因此，他著書立說，並且結合一批知識份子，形成一個政治集團，協助推行改革。但他却忽略客觀的現實環境，一批被他鄙視的草原貴族，和一批被他排斥的中原細族的知識份子，擁護太子拓跋暉，又形成另一個政治集團。這個集團不僅保守，並且掌握了實際的軍事力量，於是這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，便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鬭爭，最後太子暉領導的集團，藉所謂的「國史之獄」，徹底剷除崔浩的政治力量，使崔浩

和他的家族，以及他的支持者都遭受殺戮。這真是一個悲劇，它不僅是崔浩個人的悲劇，也是一個由文化的衝突，轉變成殘酷政治鬭爭的悲劇^①。經過這次流血的政治鬭爭後，漢文化在拓跋氏政權中暫時退縮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掌握實際政權後，才作一次徹底的調整與重組。

三

孝文帝拓跋宏對當時胡漢雜揉的文化形態，所作的調整與重組的過程中，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一次決定，就是放棄原來的首都平城，而遷都洛陽。「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」，討論拓跋宏遷都的艱難的歷程，並且在因遷都所引起的政治鬭爭中，犧牲王位繼承人，產生了家庭的悲劇。

拓跋宏執政後，最初配合他一系列的改革，將平城改建成一座典型的中國文化的都城，並沒有積極南遷的意念。最後因為無法排除北方保守勢力的壓力，祇有毅然遷都洛陽。拓跋宏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選擇洛陽作為新都，並未顧及到現實問題。就當時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的情勢分析，鄴城似乎比洛陽更適合^②。而且自北魏建國以來，一直將鄴城視為陪都。他

① 崔浩之死因，歷來爭議頗多，參見：本書第二章注一。

② 勞幹師，「北魏後期的重要都邑與北魏政治的關係」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，第四種（一九六〇），頁二二九—二七〇。